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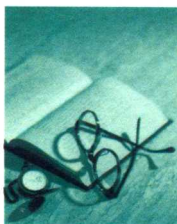
郁金香书系



Together with Emma
Reading · Writing · Baby-sitting

爱玛的想象

读书 · 写作 · 哄孩子



朱虹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郁金香书系

爱玛的想象

读书 · 写作 · 哄孩子

Together with Emma
Reading · Writing · Baby-sitting

朱虹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玛的想象：读书·写作·哄孩子/朱虹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4
(郁金香书系)
ISBN 978-7-5651-0642-2

I. ① 爱… II. ① 朱…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1168 号

书 名	爱玛的想象——读书·写作·哄孩子
作 者	朱 虹
责任编辑	向 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41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6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51-0642-2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目 录

我的本色的“女性主义”

我的本色的“女性主义” / 3

关于“性别”的“敏感” / 15

我与哈佛·燕京

——从《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到《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选》 / 20

遇罗锦，一个实话实说的女人

——在波士顿大学教书侧记 / 41

这里有真金

——记美国女作家格雷丝·佩莉 / 49

妇女文学

——广阔的天地 / 60

崇敬与怀念

记两个文化巨人的会见 / 73

我的老师朱光潜先生 / 76

忆师长：两道伤口 / 82

我的最爱

阅读与超越

——读《傲慢与偏见》第一章 / 93

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 / 102

《简·爱》与基督教《圣经》 / 113

英国 19 世纪小说中的临终遗嘱问题 / 130

市场上的作家

——另一个狄更斯 / 146

读书·写作·哄孩子

读英国的散文

——文学园地里的“孤儿院”/ 169

他在等什么？

——我读哈金的《等待》/ 183

听衣裳讲那百年的故事

——读袁仄、胡月著《百年衣裳》杂感/ 192

三十年辛劳结硕果

——读谢玉娥著《性别·习俗·文化——转型期有关问题的考察备案》/ 198

说不尽的哈姆莱特

——祝贺英国老维克剧团首次访华演出成功/ 204

悲剧英雄寇流兰

——观北京人艺演出有感 / 208

“黄颜色”的联想

——看话剧《哗变》/ 215

爱玛的想象/ 222

跋/ 228

我的本色的“女性主义”

我的本色的“女性主义”

我 1953 年从北大西语系毕业，被分配到当时还设在新北大燕园内的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室（社科院外文所前身）当实习员，导师是卞之琳先生。同时在西方室的高级研究人员还有潘家洵、李健吾、杨绛、罗大冈、罗念生、缪朗山各位前辈。提起这些名字，都是学术界的名家，可惜由于我的幼稚无知和时有动荡的社会环境，我错过了向他们讨教的宝贵机会。

我是按照国家的统一分配方案被指定到文学所的。同班同学有的被分配到外交部、外贸部和高等学校，还有的到朝鲜三八线，据说是在甄别俘虏的工作中担任口译。多少年后，我在英国的肯特大学，偶然提起当年我们全班同学在一个大教室里屏住呼吸，聆听领导一个一个地宣布每个人的去向，几位年轻的英国朋友好不羡慕，连说

“我们要是有人给分配工作多好哇!”但我自己当年并不认可,也不知道文学所是个什么去处。我一心想做中译英,在毕业分配表上填的第一志愿是外文出版社,但是没有被接受。我一直引以为憾。去年九月在中美作家论坛上碰到了外文出版社的负责同志,竟找他算 1953 年的那笔老账,他连忙说:“1953 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被外文社拒绝后,我又被人大拒绝。材料转到刚刚筹建的文学研究所,“政治不好,身体不好,英文好”,何其芳所长拍板,收下我了。多年后,当时参加文学所筹建工作的杨耀民同志告诉我:“政治不好”一指家庭出身不好,二指我说过喜欢陀斯多耶夫司基,不喜欢高尔基(什么情况下跟谁说的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你真运气”,杨耀民感慨,并鼓励我要认真努力,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1953 年 9 月 23 日,我到文学所报到上班,距离我的二十岁生日还有两个月。何所长找我谈话(他跟每个年轻的实习员都谈话),要我“学理论,读名著,积累资料,放长线,钓大鱼”,谈了整整四个小时,我终生难忘。

在此我要插入一段我考大学的往事。上个世纪 40 年代初的天津是日本占领区,学校一律开日文课。我的生父曾留学美国,要我学英文,于是把我放在天主教的住宿学校。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协议,日本占领者不干涉那座天主教圣芳济会修道院附设的圣若瑟女子学校。该校第一语言,即生活和教学语言,是英语,“外语”是法语。我在天津读了六年,后来转到北京的圣心学校,即圣若瑟



北大同学,1953 届

(后排左起:潘其俊、贾淑勤、朱虹、张致平;
前排左起:吕婉如、朱雪芹、文美惠、李守仁)

的姊妹校,老师也是圣芳济会的修女。修女老师不懂数理化,除了一点最小儿科的东西,数理化就全免啦! 1949年解放,学校关门,修女被驱逐出境,我十五岁,正值高校招生。当时北京解放不久,各大学招生还是按老规矩各招各的,各出各的题、各定各的考试时间,只不过北大、清华、燕京在同一个时间举行考试——你休想把它们任何一家当做第二志愿! 我谎报十八岁,投考辅仁大学英文系,脑子里除了英语,一片空白。面对数理化卷子,不知哪儿来的灵感,大笔一挥,写起了英文作文,“论证”我要学英文,管你什么数理化! 多年后,我的老同事董衡巽说:“朱虹呀,你是中国第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进了大学门,我第二年考转学,报北大——考转学没有数理化!

说起我的外国文学研究，很惭愧，尽管有导师和周围多位专家的指点，但我的基础太差，残缺不全的教育注定我是做不好的。按领导的规定，我的“学徒生活”是从阅读英美左倾作家开始的，有一个长长的书单，每读完一个作家集，要求写一篇读书报告。我最早的一篇读书报告是关于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小说，我批评他粗糙、乏味、瞎编，我没有进行阶级分析，只是读原文，跟着感觉走。这种读书报告当然不及格，更谈不上发表，无异又交了一张白卷。1956年，法斯特脱离美国共产党，我国媒体对法斯特由吹捧转为批判，我的导师卞之琳兴冲冲地把我那篇“三年早知道”的旧文拿到《文艺报》，但遭到退稿。理由是我写的“不是政治批判”。后来卞先生亲自动手修改，我的“处女篇”1958年才得以在《文学研究》上发表。向来处人处事恬淡的卞先生对我破格的扶助，事隔五十年，至今难忘。



与卞之琳师长、作家刘年龄女士

后来，领导改要我用三年时间读莎士比亚全集及其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包括评论和历史社会背景。多亏燕京大学留下来的藏书，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线放得够长，可惜没有钓出大鱼，愧对敬爱的何其芳同志和导师卞之琳的培养。60年代初，由于萨克莱纪念文章的契机，我的研究方向终于定在英国19世纪小说领域，这本来也是我的最爱，可惜“文革”爆发了。改革开放后，我断断续续凑成一部19世纪小说的论文集子，按照自己的趣味，偏重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对女性心理的描写：女性的机智，女性的等待，女性的积怨，女性的复仇……我力推几个在国内被忽略的女作家，如安·勃朗特和布雷登夫人以及威尔基·柯林斯、安东尼·特罗洛普等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有独特成就的男作家。

关于西方文学研究，我从来认为中心在西方（正如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心在中国）。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外语刊物在同一个国际平台上与各国学者互相探讨，共同促进该学科的发展。这种刊物，听说印度都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我自己在英、美、澳大利亚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都是评介性的，不能算研究。我以为，我们50年代的人，搞西方文学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是过渡性的一代，应该“搭桥梁”和作“垫脚石”（当然有例外，我不能以自己的短处强加别人，妄加评论）。此外，当时的研究工作，还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图书的缺乏。以我们社科院外文所来说，订购国外图书，外汇的配额是按

“股”分的，英、美、加、澳、新、爱尔兰等十来个英语国家算一股，看来是按语种分配的。可是东德、西德算两股，看来是按国家分配的？想当年，文学所建所初期，钱钟书先生亲自过问图书，成立了由钱钟书、李健吾等专家组成的图书委员会。后来外文所从文学所分出来，钱钟书先生亲自主持分书，一本一本本地分！

我寄希望于 80 年代后那些受过正规训练的新一代。80 年代初，在美期间我曾约钱满素博士一起，向哈佛—燕京学社递交一份倡议，要他们出资在中国办一个外国文学方面的英语刊物，以便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对话。答复是这种做法不符合该学社的章程，只好作罢。但当时哈佛—燕京学社主任韩南教授提出，愿意资助出版中国年轻学者的博士论文或新著。出版社方面，韩南教授的首选是社科出版社或北大出版社。可是，他事后对我说，对方都反应冷淡。1992 年，哈佛大学举办“性别化与中国：妇女、文化与国家”（Engendering China）研讨会，我拉着与会的三联总编董秀玉到哈佛燕京学社跟韩南见面，他们二十分钟（我当翻译，看着表的）谈妥，由此产生“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从 1994 年开始，已出版了七十多种，现在还在继续出版。

80 年代初我的主要精力用在从零开始的研究生工作中，起初罗大冈先生任系主任，我是副主任。后来罗先生不再挂名了，我当主任。主任也好，副主任也好，我认定这个工作就是当“垫脚石”。我动员自己的同行，大家

一起当垫脚石，为新一代学者铺路。在同事的支持下，我这个没有任何学位的大白丁全面抓起研究生工作：出题、考试、阅卷、面试……没有任何教学条件，开不出课，我满城跑，请人来演讲。我把这叫做“从无到有”。另一方面，有时也搞点“从有到无”。譬如邓力群院长规定研究生人人必读《资本论》，我打报告申请把《资本论》改成《反杜林论》以适合学习外国文学的需要。赶上“清污”，我关起门来写报告证明我们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无论是包德莱尔还是艾略特或是什么别的题目，一概不存在资产阶级之“污”。其实那么多论文，我何曾都读过。后来我知道，不论是《资本论》还是《反杜林论》，同学们多是读辅导读物，上头的规定难不倒这帮年轻人，不劳我使出那些小伎俩。至于“清污”，后来也不了了之。我倒是不后悔曾经组织英美专业的研究生检阅开国以来外国文学方面的文章，梳理其三十年来的艰难与曲折，以便他们在更高的起点上去开拓一番新的天地。后来这份总结好像是用集体的名字发表了。

80年代初好像社科院还没有建立外事局，有些外宾的接待工作交给外文所去办，外文所有时就由我做具体工作。最早来访的丹尼尔·艾伦、海伦·万德勒、伯克维契、罗伯特·凯利、唐·斯通等不仅为我们做了有益的讲学，而且还对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做出了贡献。



哈佛大学美国文学教授 Daniel Aaron 和 Janet Aaron 夫妇

此外我还有幸参加经济学家凯恩·克劳斯爵士率领的英国学术院访华团的接待工作，在邓小平同志接待时，担任了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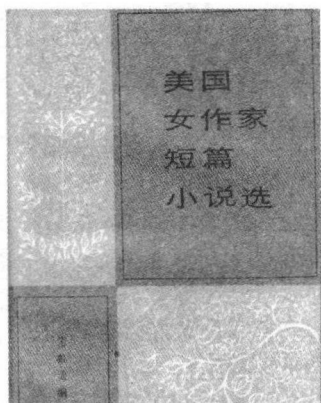
80年代对我来说是我的“女性主义”觉醒的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使我和许多我的同代人一样，摆脱思想桎梏，学着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譬如说，从性别的角度观察和解释周围的世界，套用过去几十年通用的“阶级敏感”，我把它叫做“性别敏感”，后来在一篇短文《关于“性别”的“敏感”》里，总结了自己的心得，现附于后。

1980—1981，我在美国，开始读一些美国女作家的小说，很喜欢，于是动了一个念头，想把她们介绍给中国读者。当时中美还没有签订什么版权协议，我比较放手地编选了一部《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其中的作品有控



1990 意大利 Bellagio, 洛克菲勒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诉的,哀伤的,有愤怒的,有哲理的,有嘲讽的,有探索的,当然还有大胆自我确认的,概括起来就是发扬了“女性意识”。许多朋友帮忙翻译,我自己写了一篇前言,于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编这本书的出发点主要是介绍“妇女意识”,引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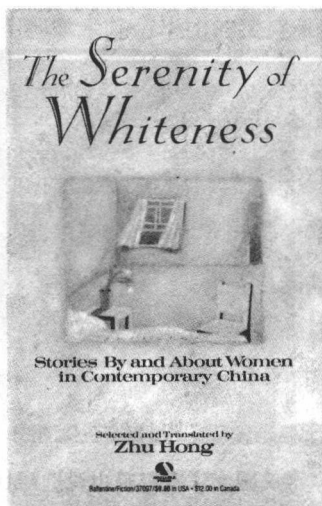


《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封面

“性别”视角。就这样,从英国女作家到美国女作家,乃至

于其他各国的女作家,我喜欢上了女性的写作。

1981年回国后,我发现了我们中国自己的女作家群,并热烈地读起来。这就是我后来编译《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短篇小说选》(*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纽约, 1991)和《花的节日——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选》(*Festival of Flowers: Essay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南京, 1995)的契机。我想让外国读者听到中国女性的各种声音,让他们了解中国妇女的状况。除了知名作家如杨绛、冰心、黄宗英等老一代和当红的张洁、张抗抗、铁凝等人,我还选了当时还不大知名的女作家如天津的谷应、江西的胡辛、四川的包川、甘



***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封面**

肃的牛震环等。译介女作家,我觉得自己更能在感情、情绪上跟她们产生认同和共鸣。譬如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描写了捉襟见肘的生活和病痛给敏感的女性造成的压迫,不像有些西方古典小说里描写的浪漫悲情,而是由猥琐、卑下的小东西、小事情构成的精神压迫。